

# 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的发展与评述

陈涛涛 张建平 陈晓\*

**摘 要:** 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该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具有系统的相关性。鉴于 IDP 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过程对当今世界实施“开放式”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对 IDP 理论的内涵、发展脉络及其缺憾进行了综述,以期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挖掘和完善 IDP 理论的动态变化机理,为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开放式发展战略的可实现性打下理论基础。

**关键词:** IDP 理论; 吸引外资; 对外投资

## 一、对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进行综述的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及国际管理学教授约翰·邓宁(John H.Dunning)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下称 IDP 理论)。该理论一方面涉及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涉及一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因而 IDP 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际经济学领域和国际管理学领域的广泛关注。相对于当时欣欣向荣的经济增长研究领域和蓬勃兴起的资本国际化与全球化的研究领域,IDP 的超强人气就在于,其把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与其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联系起来,并认为两者具有系统性的相互联系。正如另一位知名学者 Sanjaya Lall(1996)所评论的,IDP 理论,相对于其他理论,虽然更加复杂和大胆(ambitious),但其仍不失为理论的前沿,并且为一国的国际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从一国经济发展的角度,IDP 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发展阶段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因而几乎各国的学者都对 IDP 理论兴趣浓厚。然而,对 IDP 理论更加重视的是正处于经济起步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因为 IDP 理论似乎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明确的发展道路,即伴随着对外开放、吸引外资过程的不断深化,一国将获得不断的经济发展,最终积累和缔造出充分的对外投资能力。不过,当今世界,一方面全球化的程度远高于 IDP 理论初创的年代,另一方面 2000 年以来经济的大起大落使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世界经济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初见成效的开放战略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与此同时,IDP 理论的动态可实现性,也将接受进一步的考验。

\* 陈涛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邮编:100084),E-mail:chentt@sem.tsinghua.edu.cn;张建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邮编:100038);陈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邮编:100084),E-mail:chenx3.07@sem.tsinghua.edu.cn。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24)和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20110002110046)的资助。

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1978年以来的开放政策使我国的引资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自2004年起,我国的对外投资也呈现迅猛增长。事实上,我国就是典型的实施“开放式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三十多年实施“开放式发展战略”的经历,无论对我国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实施类似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值得深入探究和借鉴的。为此,透彻理解IDP理论的内涵及其发展进程,也将为我们深入探讨我国开放式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增长潜力提供理论基础。

有鉴于上述IDP理论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将首先就IDP理论本身及其内在逻辑做简要的介绍,进而分析IDP理论创建以来的发展脉络,其后我们将对国际国内学者针对IDP理论的实证检验进行综述,最后在此基础上给出我们对IDP理论发展状况与态势的评述并提出未来IDP理论动态发展的方向。

## 二、IDP理论本身及其内在逻辑

IDP理论是邓宁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为基础提出的,虽然IDP的理论模型中并未包含OLI理论的相关变量,但利用IDP理论检验各国实践时,其结果必须采用OLI理论来加以解释。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认为,OLI理论是IDP理论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较为完整地借鉴IDP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下面我们将对OLI理论和IDP理论做简要的陈述。

### (一)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是邓宁在吸收国际经济学各派学说、综合已有的投资理论与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集大成的跨国企业理论。

OLI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国际生产是因为以下三种优势的存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有的时候被称作竞争或者垄断优势,它是指跨国公司想要与东道国的企业竞争必须具有的特定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必须足以弥补设立和操作国外的增值运营所需要的成本。所有权优势包括两大类:一是资产性所有权优势,指跨国公司拥有的特定资产(如专利、商标等)所带来的专有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存在于结构性市场失灵;二是交易性所有权优势,指在存在交易性市场失灵时,跨国公司通过跨国经营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内部化优势,是指当某些产品和技术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时往往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所以跨国公司倾向于到国外投资,并在母、子公司或各子公司之间进行中间产品的交易,由此,公司可以通过内部交易替代市场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获得内部化优势。内部化优势解释了为什么具有所有权优势的公司不采用出售所有权或者许可外国公司生产的方式,而是采取跨国生产,因为它有能力通过内部化来利用自身优势,从而获得更多利益。所谓区位优势,是指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自然、经济和制度等方面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因素,从而使投资于该国的企业会在成

本、效率等方面获得竞争优势的特点(John H.Dunning, 1988)。邓宁认为,只有把跨国企业自身的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才能确保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

## (二) 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

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的奠基性论文,是邓宁 1981 年发表的《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一文,在其中他提出,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 GNP 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对外净投资(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将沿着某种特定的路径变化,先后经历四个发展阶段(John H.Dunning, 1981)。此后,包括邓宁本人在内的一些学者,对邓宁原始 IDP 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1986 年,邓宁本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投资发展的第五阶段(John H.Dunning, 1986),并在 1996 年与 Narula 合著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John H.Dunning, Rajneesh Narula, 1996)。以下我们对 IDP 理论五阶段论的描述正是基于此书。

处于第一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都很小,其对外净投资额等于零或是接近于零的负数。在这个时期,一国经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交通信息设施匮乏。其结果,一方面,由于该国缺乏足够的区位优势而无法吸引外资流入;另一方面,该国的企业在此条件下也没能积累任何所有权优势,因此没有能力对外投资。

处于第二阶段的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增长,而对外直接投资仍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其对外净投资额小于零且绝对值不断增加。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或购买力的提高,使外国企业对该国直接投资并在当地生产成为可能。外国企业凭借在无形资产(如技术、品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所有权优势,与该国区位优势相结合,通过直接投资的形式来达到控制资源和利用东道国廉价劳动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发展后,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逐渐增长,这些优势主要存在于围绕着初级产业发展起来的支持性产业、半熟练的制造业及适用性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在政府政策鼓励下,国内企业开始对外投资。

处于第三阶段的国家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的放慢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加速为标志,对外净投资开始转入正增长,但仍为负值。在这一阶段,对外资企业而言,由于国内企业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源等所有权优势增加,加之本国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对高档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外资企业更注重输出新技术,并加大向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领域投资。对于国内企业而言,除少数高新技术领域外,企业在许多领域的所有权优势都达到了可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抗衡的水平,随着国内市场需求趋于饱和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国内企业纷纷开始向国外投资,以寻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其中,流向第一和第二阶段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其动机既有寻求市场型,也有贸易替代型;对第三和第四阶段国家的投资,就不仅是作为一种寻求市场的战略,同时也是为

了获得战略资产,以保护和提高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处于第四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且前者的增长率高于后者,对外净投资额为正值,且不断增加。在此阶段,国内企业不仅与外国企业在母国已具备竞争优势的国内部门进行有效的竞争,还能打入外国市场。流向这一阶段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其他处于较高阶段国家的企业寻求资产的投资。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一般为交易性所有权优势,而不是资产性所有权优势,并且来自于其跨国性本身。此外,还有部分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来自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这类投资的性质可能是寻求市场、与贸易相关和寻求战略资产的。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这不仅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也是为了把正在丧失竞争力的生产活动转移到海外较低阶段的国家,以保持其竞争优势。为在国际竞争中获益,对外投资具有更强的市场内部化倾向<sup>①</sup>。

在第五阶段,一个国家对外净投资先下降,继而开始围绕零水平上下波动,同时存在大规模、高效率的资本流入和流出。与前四个阶段相比,此阶段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以人均 GNP 指标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衡量已不能很好地反映优势变化,国际直接投资水平也不是必然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趋势保持一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凭借更多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运作,并分享大部分资本流动和区位优势带来的利益。20 世纪末的发达国家即是这种情况(John H.Dunning、Rajneesh Narula, 1996)。

综上所述,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认为,各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系统的相关性,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国际直接投资将呈现出特定的变化规律其图形上表现为:在前四个阶段对外净投资额呈 U 型或 J 型曲线分布,在第五阶段又将返回零水平上下波动(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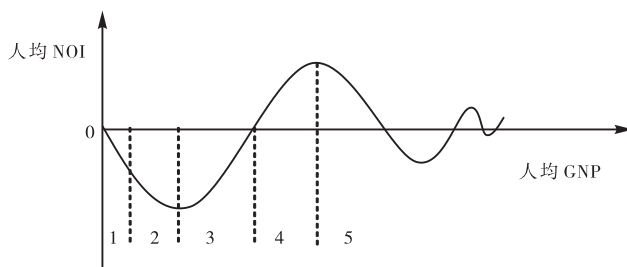


图 1 投资发展路径的五阶段

① 邓宁(1981)采用 1967—1975 年的数据,对于处于 IDP 四个阶段的国家的人均 GNP 水平给出了数值范围,其中处于第一阶段的国家其人均 GNP 在 400 美元以下;处于第二阶段的国家其人均 GNP 在 400-1500 美元之间;处于第三阶段的国家其人均 GNP 在 2000-4750 美元;处于第四阶段的国家其人均 GNP 在 2600-5600 美元之间。其中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人均 GNP 范围有重合,说明特别是在投资发展阶段后期,投资行为不能仅仅通过人均 GNP 来解释。

### 三、IDP 理论的发展脉络

基于我们可得的文献,我们认为,IDP 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条脉络。

#### (一) 不断探究影响一国对外净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

在 1981 年的初次探索中,邓宁研究了 67 个国家在 1967—1978 年间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得出了一国的对外净投资与该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系统的相关性的结论。在模型中,一国的经济发展是用人均 GNP 指标来反映的,因而从模型的表面上,一国的对外净投资就主要由该国的人均 GNP 水平所决定。然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邓宁发现,有些人均 GNP 水平相似的国家实际对外净投资额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英国和新西兰;而对外净投资额相似的国家其人均 GNP 水平也可以相差甚远,例如澳大利亚和牙买加。对于这种现象最明显的解释是,各国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人均 GNP 水平这一单一指标不足以充分反应一国的经济结构。例如,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对外净投资的人均水平会比资源型国家高,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人均水平比资源型国家低。同样,一国的市场规模也会影响其投资发展路径,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会在较早的阶段表现出 NOI 的正值,而对于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则正好相反(John H.Dunning, 1981; John H.Dunning, Rajneesh Narula, 1996)。

事实上,邓宁虽然成功地利用 OLI 理论对 IDP 理论的内涵进行了解释,但 OLI 理论所包含的诸多变量并没有在 IDP 模型中得到直接的反映。相对于 IDP 模型,OLI 理论所包含的变量要复杂得多,而且不仅涉及目标国家,还涉及与目标国家具有流入流出关系的其他国家。因此,如何把握对 IDP 模型具有关键影响的 OLI 理论中的重要变量以及能够充分反映一国经济结构的其他重要变量,成为了 IDP 模型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同时这也成为了后期各国学者努力完善该模型的一个方向。在这方面,邓宁本人(John H.Dunning, 1981)、Tolentino(1993)、Narula(1996)、Xiaohui Liu、Trevor Buck 和 Chang Shu(2005)以及我国的学者李辉(2007)等都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 (二) 进一步探讨 IDP 理论对后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当 IDP 理论初步形成的时候,国际投资的 90%以上都是源于发达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现象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线,IDP 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净投资地位的适用性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1986 年,基于对 25 个发展中国家对外净投资的分析,邓宁认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其经济结构如何,也无论其政府采用怎样的策略与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其对外净投资的地位仍然会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OLI 理论也能比较确切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能力。其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主要取决于与该国的资源禀赋相关的优势要素。除此以外,邓宁特别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投资发展过程的速度和方向也将取决于其政府的政治目标以及政府在本国与国际经济进行沟通与交换中的作用(John H.Dunning, 1986)。其后,邓宁又分别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对外投资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邓宁等注意到,这些在第二波投资中表现

突出的亚洲新兴工业国恰恰伴随着其经济的迅速发展,而那些虽然在第一波中占有主要地位但之后在对外投资中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主要有印度、菲律宾、阿根廷等)则表现出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为负增长。所以,这次发展中国家第二波对外直接投资完全符合了 IDP 的预测(John H.Dunning, 1996)。

此外,日本学者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 1996)以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国为例,在行业层面进一步发展了 IDP 理论。他提出,每一个行业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的发展路径可以被称作中观投资发展路径(meso-IDP),而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一国将会经历从低附加值、低技术的行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的行业发展,从而形成一系列的中观 IDP 曲线,各个行业的投资发展路径所形成的包络曲线就是邓宁的宏观投资发展路径(macro-IDP)(见图 2)。采用 GDP 作为 IDP 理论中“经济发展”的替代,其重要的不足在于没有考虑到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化(John H.Dunning, Rajneesh Narula, 1996),因此将投资发展路径细化到行业层面更有利于理解 IDP 理论描述的发展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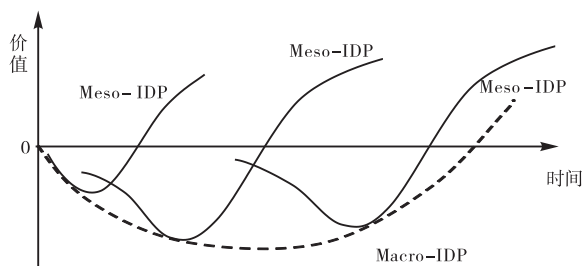


图 2 小泽辉智的中观投资发展路

### (三) 关注并不断探讨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对于 IDP 理论的影响

上世纪 80 年代至世纪末,恰逢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全球 FDI 迅猛增长的时期。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断展示出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新现象本身也给了邓宁等学者相应的机会,通过不断地探触新的变化,修正和进一步完善原有的模型。邓宁和 Narula(John H.Dunning, Rajneesh Narula, 1996)对 IDP 模型第五阶段的补充、对跨国并购以及非股权形式的跨国公司活动对 IDP 影响的探讨,都是针对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提出的。

关于 IDP 模型第五阶段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观察。首先,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由于日本、欧盟等国家对美国的快速追赶,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从而使这些国家对 FDI 的吸引力与美国开始拉近;其次,这段时间,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特别迅猛,其行为特征更强调通过跨国联盟与跨国并购来获取战略性资产,从而追求效率的提高;其三,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已经较少地依赖本国与自然资源相关的资产优势(natural asset),而是更多地依赖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所带来的优势。相对于自然资源性资产,创造性资产具有高度的可转移性,是可以通过跨国联盟或并购行为所获得的。基于上述理由,邓宁等认为,在 IDP 第四阶段之后应该存在第五阶段,即这些国家

既会因具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而对同等收入的国家 and 较低收入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也因其拥有有价值的创造性资产而成为同等收入的国家、甚至收入较低国家的资本所投资的目的地。因而,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吸引的资本流入和对外的资本投出会在平衡点附近徘徊,其对外净投资也就会在零附近震荡。

进而,针对旨在获取战略性资产的跨国并购的蓬勃兴起,邓宁和 Narula 又在五阶段论的基础上对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进行了再次的修正。他们(John H.Dunning, Rajneesh Narula, 1996)认为,近年来这种战略资产获得型 FDI(如跨国兼并收购)的出现可能会提高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高级创造性资产的主要拥有国)的吸引外资水平;同时由于即使所有权优势处于弱势的企业也可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水平也将提高,从而使传统的投资发展路径曲线变得更为平缓(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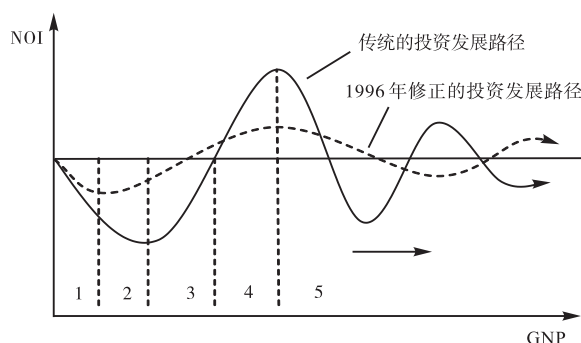


图3 邓宁和 Narula (1996) 修正的投资发展路径

同时,观察到战略联盟等非股权形式的跨国公司活动的增长,邓宁和 Narula(John H.Dunning、Rajneesh Narula, 1996)认为,这类国际生产活动作为 FDI 的替代和补充,其对于 IDP 的影响是不能被忽略的。如果将这种非 FDI 形式的跨国公司活动包含到 IDP 中,那么中低收入国家的内向跨国公司活动会增多,而高收入国家的内向和向外资源转移均会增多。

#### (四) 不断强调政府在影响投资发展路径上的重要作用

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工业国,在经济发展上令人瞩目的成就和投资发展路径上的快速迈进,这些国家政府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引导作用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被邓宁等学者所反复强调。

邓宁和 Narula(John H.Dunning、Rajneesh Narula, 1996)认为,国家政府通过许多宏观经济和组织政策,对于一国的 IDP 结构起着有力地影响。无论是使用国家横截面数据还是分国别的纵向数据都表明政府行为将影响 IDP 的发展。在政府对吸引外资的影响上, Narula 和邓宁(Rajneesh Narula, 2000; Rajneesh Narula、John H.Dunning, 2010)认为,东道国要想长期从吸引外资中获益,政府必须要培育国内特殊的区位优势,并且同时提高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在促进吸引外资的产业政策上,由于跨国公司活动存在异



质性,因此政府应该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不是采取一般的、普适性的政策。邓宁等(John H.Dunning、Roger van Hoesel、Rajneesh Narula, 1996)在解释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等亚洲新兴工业国或地区对外投资快速发展的原因时,也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指出这些经济体的当局在政策上具有全局性,将对内和对外 FDI 看成整体政策,将促进其内部经济持续升级作为长远目标,并且在政策上顺应全球化和开放的大势,促进了经济结构的适时和快速转变。此外, Hoesel(Roger van Hoesel, 1996)和 Zhang、Bulcke(Hai-Yan Zhang, Danny Van Den Bulcke, 1996)在分析我国的台湾地区和中國大陸投资发展路径的快速发展时也分别强调了当局的重要作用。

#### 四、国际、国内学者对 IDP 理论的实证检验

自从 IDP 理论创建之后,国际、国内的学者纷纷以不同时段、不同国家的样本对 IDP 模型进行了检验。与此同时,由于该理论对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不少学者也利用此模型对目标国资本净流出的地位进行考察和分析。

##### (一) IDP 理论的主要实证检验模型

IDP 理论的实证检验模型主要为二次函数和五次函数两种。由于在 IDP 理论所阐释的图形中,对外净投资随 GNP 的变化呈现出 U 型或 J 型曲线的特点,接近二次函数的图像,因此邓宁(John H.Dunning, 1981)、邓宁和 Narula(John H.Dunning、Rajneesh Narula, 1996)以及各国学者在对 IDP 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时主要采用二次函数模型来描述投资发展路径曲线(见模型 1)。其后, Buckley 和 Castro(Peter J.Buckley、Francisco B.Castro, 1998)在研究葡萄牙投资发展路径的论文中首次采用了五次函数的模型(见模型 2)<sup>①</sup>。

$$\text{模型 1: } NOI_{pc} = \alpha + \beta_1 GDP_{pc} + \beta_2 GDP_{pc}^2 + \mu$$

$$\text{模型 2: } NOI_{pc} = \alpha + \beta_1 GDP_{pc}^3 + \beta_2 GDP_{pc}^5 + \mu$$

Buckley 和 Castro(1998)指出,通过对数据图形的观察,五次函数模型更加适用。并且在理论解释的角度上,二次函数包含着这样的假设:在投资发展路径的初始阶段,人均 NOI(一国的对外投资减去对内投资的差额)急剧下降,人均 GDP 则缓慢增长,而根据邓宁和 Narula 的描述,在投资发展路径初期,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应该快于人均 NOI 的变化速度,因此五次函数模型能够更好的适用于描述投资发展路径的演变。

##### (二) 国际学者对 IDP 理论的实证检验

从国际上看,1993 年到 2008 年间,众多学者利用多国横截面数据或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其中大部分结论是直接支持 IDP 模型的理论假设的。例如, Buckley 和 Castro(1998)利用 1943—1996 年的数据采用二次函数和五次函数模型对葡

<sup>①</sup> 其中  $NOI_{pc}$  为人均对外净投资,  $GDP_{pc}$  为人均 GDP。



葡萄牙的研究; Michael J. Twomey (2000) 针对加拿大 20 世纪的研究, 均得出对外净投资和人均 GDP 之间的确存在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所描述的关系的结论。Barry、Gorg 和 McDowell (2003) 利用 1980—1999 年间爱尔兰和美国的双边直接投资总量数据采用二次函数模型分析了爱尔兰对美国的投资发展路径, 也验证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的 U 型曲线特征。此外, Gorynia、Nowak 和 Wolniak (2007) 针对波兰的研究、Boudier (2008) 采用二次函数模型针对中、东欧国家的研究、Fonseca (2008) 使用 25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及专门针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研究等都验证了 IDP 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路径。Xiaohui Liu、Trevor Buck 和 Chang Shu (2005) 针对中国的研究中, 在 IDP 模型的基础上, 以对外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除了人均 GDP 之外, 还尝试加入了人力资本积累、出口和外资流入, 其结果表明人均 GDP 和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而其他两个解释变量则不显著。

当实证检验与 IDP 原模型的描述有所不同时, 学者们会进一步探讨造成现实与 IDP 模型不符的原因所在。在探讨的各种理由中, 多数还是与 OLI 理论所涉及的复杂因素相关, 如一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的规模、东道国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创造性资产以及企业的投资能力等方面; 此外, 一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因素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例如, Bellak (2001) 针对奥地利的研究, 他发现在 1980—2000 年间, 该国的对外净投资额与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并且随行业类型及合作国类型的不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他认为, 这一结果说明, 在这种国内市场规模小的情况下, 决定投资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发展水平, 而是国内的地域和行业结构以及所推行的政策。再比如, Pichl (1989) 通过研究 18 个国家的 FDI 流动, 发现小规模、高发展水平的国家, 相比于大规模的国家, FDI 流入占 GDP 的比重更高, 可能是由寻求效率型的 FDI 导致。FDI 流出并不是由国家规模决定的, 企业层面的因素与国家的发展状况则对其存在重要影响。此外, Calderon、Mortimore 和 Peres (1996) 分析了墨西哥的 FDI 流入流出的发展过程, 指出由于墨西哥的发展战略中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墨西哥一直停留在 IDP 的第二阶段, 并未向第三阶段发展。另外, 针对现有的研究, IDP 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Narula (2010) 近期提出了“广义 IDP”的概念, 并指出, 狭义的 IDP 主要聚焦在 FDI 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由此而简化生成的二维图形可能会掩盖他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广义的 IDP 则聚焦在研究 FDI 和发展之间的深层作用机制。

### (三) 国内学者对 IDP 的实证检验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 20 世纪 90 年代, 我国主要是在微观层次对邓宁的企业跨国经营的 OLI 优势理论进行研究和借鉴, 而对其宏观层面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研究较少。到本世纪以来对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的研究开始升温,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范围, 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对 IDP 理论本身的检验; 另一部分是检验 IDP 模型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其中对 IDP 模型进行检验的研究

有：刘红忠(2001)采用1988—1995年32个国家的数据，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采用46个国家1995—2001年间的数 据分别建立二次函数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陈漓高、黄武俊(2009)采用1981—2007年的数据，使用二次函数和五次函数多国时间序列模型对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进行检验，他们回归结果都证实了该理论。在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都认为中国的投资发展路径符合IDP模型所描述的曲线路径。其中，刘红忠(2001)首次对我国投资发展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他采用了1992年我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横截面模型，并采用了1992—1993年的24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表明，我国各省市的对外净投资服从J型曲线分布，符合IDP理论假设。涂万春和陈奉先(2006)利用中国1982—2003年间的国际直接投资与GDP数据建立二次方模型和五次方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符合IDP理论的U形曲线假设，我国处于第二阶段末或第三阶段初。姚永华、苏佳丽和陈飞翔(2006)采用我国1982—2004年的数据，李辉(2007)采用我国1980—2005的数据建立模型，得到了与涂万春和陈奉先类似的结论。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我国的对外净投资符合J曲线路径，但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例如，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利用1984—200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人均GDP的水平及其变化的确很好地解释了对外净投资的变动，符合IDP模型假设；并且根据对检验结果的分析，我国处于第二阶段。然而，按照多国样本模型的实证结果对各阶段人均GDP的界定，我国的人均GDP应该落入第三阶段组，这两者不一致，说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薛求知和朱吉庆(2007)利用我国1982—2003年间的数 据使用二次函数模型验证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结果表明中国处于第二阶段；然而如果直接套用邓宁的经验数值对于人均GNP的界定，按照经过PPP折算的人均GDP(2003年为4980美元)，中国应该处于第三甚至第四阶段。由此他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包括：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一方面促进大量外资流入，另一方面国内企业缺少对外投资的压力和动力；第二，中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不能很好地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此外，李辉(2007)在影响IDP模型的关键要素方面做了更多的尝试。在增加了人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人均出口、全球GDP、全球出口、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为新的解释变量，并以人口和GDP总额为控制变量，他建立了以人均对外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55个国家、1980—2004年间的 面板数据模型。使用PCSE(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方法对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均GDP、出口、全球总需求和全球贸易总量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政府支出比重也是一个显著因素，而服务业比重系数比制造业比重系数更加显著。

除了国家层面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以我国的某个具体的省市为研究对象，对其对外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和检验。例如，郑亚莉和杨益均(2007)针对浙江省的研

究以及董佺、杨清和曹宗平(2008)针对广东省的研究等。

## 五、对 IDP 理论及其发展的评述及动态 IDP 理论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 (一) 对 IDP 理论及其发展的一般评述

基于对 IDP 理论自身、发展脉络以及实证检验结果的综合分析,我们对该理论的发展现状有以下几点判断。

第一,从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的本质和内在逻辑出发,我们认为,到 1996 年为止的投资发展路径的五阶段理论是比较完善的;特别是,如果我们根据该理论建立的理论基础,将 OLI 理论与 IDP 模型相结合,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不同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对外净投资地位进行合理的解释。第二,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IDP 模型所反映的一国对外净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系统性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 IDP 模型中并没有将经济发展以外的变量囊括进去,采用 IDP 模型对一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净投资地位进行判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三,由于各个国家的自然条件、经济结构以及发展水平和战略的不同,各个国家的投资发展路径呈现出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客观的、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在探讨每个国家的投资发展路径时,应从该国的自身特点出发,沿着经济发展及 OLI 理论所涉猎的变量范围,探讨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关键影响要素,从而理解适合于该国特殊环境的投资发展路径。第四, IDP 理论自开创以来,邓宁及其他学者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发展路径方面的探索以及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 IDP 理论的不断完善,为后人对动态 IDP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指明了方向。

### (二) IDP 理论本身内涵的、尚未解决的问题

#### 1. “完整”国家案例的缺失

探究 IDP 理论的实质,它描述了一个投资发展的“路径”,或者说是“发展过程”,即一国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其资本流入与资本流出的相对数量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以至于对外净投资的地位也随之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有鉴于此,如果我们回顾现实中那些处于 IDP 理论所描述的高级阶段的国家,就不难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经历过 IDP 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过程!

处于 IDP 模型第四、第五阶段的最典型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其中,英国是全球范围内被公认的实施对外投资最早的国家。英国显然没有机会经历一个从吸收外资发展到对外投资的过程;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确实因其具有天然的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吸引了欧洲国家的投资,但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地位。其后,美国就一跃成为了对外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因此,我们也不能认为美国曾经经历了 IDP 理论

所描述的发展过程。再用以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著称的两个典型的追赶型国家日本和韩国为例。其中,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是在一种国家相对封闭、政府刻意限制 FDI 进入的条件下,通过大量购买西方先进技术、同时激励国内企业实施反向工程的方式,逐步发展起来的;而韩国由于国土狭小、本土市场需求不足,政府将国家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面向了国际市场。在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与日本相类似,韩国对外资也采取了限制的态度,而通过大量的政策手段激励购买和许可使用国外先进技术,最终锻造了韩国大企业(Chaboh)的对外投资能力。由此,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与对外净投资地位都与 IDP 所描述的路径没有密切的联系。

从这个角度考察,只有那些在发展过程中实施了开放的政策,允许外资进入本国,并期待外资能够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才可能真实地经历 IDP 理论所描述的投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学者们可以通过数据检验后宣称,某个国家的对外净投资可能符合 IDP 模型描述的某个特定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国就经历了 IDP 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过程。

## 2. 外资流入对对外投资作用机制的不确定性

根据 IDP 理论所描述的投资发展路径,一国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似乎是一个单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吸引外资对一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与能力的积累都起着正向推动的作用。然而,在现实的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外资对一国的流入并不会自动地对该国的产业升级和本土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已经被与 IDP 理论几乎同期发展起来的 FDI 溢出效应理论所证实(Blomström,Kokko,2001)。因此,IDP 理论所描述的“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的单向机制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与现有的 IDP 模型相联系,我们认为,被解释变量设置为“对外净投资”虽然便于把握一国的对外净投资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该被解释变量的设定,也人为地切断了外资流入与对外投资的相互联系,因而仅仅依靠现有的模型设置,我们也无法对外资流入对对外投资的深层作用机制进行考察。

## (三) 动态 IDP 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方向

与前述的 IDP 理论的发展脉络相联系,我们认为,当前 IDP 理论所存在的缺憾,恰恰是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缺乏真实、完整的国家案例的原因主要是,“开放式的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本来就是 80 年代前后开始的新的尝试,而一国的发展本身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外资流入对对外投资作用机制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的普遍加深与世界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之间的深层次冲突与矛盾。然而,这种复杂化的新形势,特别是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复苏缓慢的现实条件,正是进一步推动和探究动态 IDP 理论的适当时机。与此同时,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探讨与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直接相关的 IDP 理论的动态实现机制,对于当今广泛采用开放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邓宁等学者创立的 IDP 理论的发展过程及现状,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动态 IDP 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第一,关注一国外资流入对该国对外投资能力的影响及其影响的变化过程,着重探讨其深层影响机制及其变化规律;第二,同时关注全球化发展态势与各国政府主导的开放或限制性开放的发展策略。其中,全球化发展态势反映了全球资本国际流动的新动向以及现有资本格局变化的可能性;各国政府主导的开放策略反映了各国为满足本国发展目的与外来资本的博弈过程。第三,利用“开放式”发展的眼光,重新透视已达到相当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动态演变过程,从中挖掘“转化”得以实现的机制因素。第四,特别重视正在实施开放式发展战略的国家的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地详尽探讨有效利用外资、着实推动产业升级及本土企业对外投资能力提高的内在机制与政策措施。

### 参考文献

- [1] 陈漓高, 黄武俊. 投资发展路径(IDP): 阶段检验和国际比较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09(9): 51—57.
- [2] 董 伦, 杨 清, 曹宗平. 广东省与亚洲地区对外投资发展阶段及经济水平的比较分析[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8(1): 114—116.
- [3] 高敏雪, 李颖俊.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与中国现状的探讨[J]. 管理世界, 2004(1): 55—61.
- [4] 李 辉. 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J]. 经济研究, 2007(2): 38—47.
- [5] 刘红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及国际比较[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34—70; 101—108.
- [6] 涂万春, 陈奉先.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实证分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2006(2): 54—56.
- [7] 薛求知, 朱吉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07(2): 36—40.
- [8] 姚永华, 苏佳丽, 陈飞翔. 我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06(10): 96—101.
- [9] 郑亚莉, 杨益均.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与趋势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07(5): 32—37.
- [10] Alvaro Calderon, Michael Mortimore, Wilson Peres. Mexico: Foreign Investment as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C]. in John H. Dunning, Rajneesh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40—79.
- [11] Christian Bellak. The Austr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2001, 10(2): 107—34.
- [12] Fabienne Boudier-Bensebaa. FDI-assisted Development in the Light of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Paradigm: Evidence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2008, 17(1): 37—63.

- [ 13 ] Frank Barry, Holger Gorg, Andrew McDowell. Outward FDI and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of a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Ireland[J]. *Regional Studies*, 2003, 37(4): 341—49.
- [ 14 ] Hai-Yan Zhang, Danny Van Den Bulcke. China: Rapid Changes in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C]. in John H. Dunning, Rajneesh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90—418.
- [ 15 ] John H. Dunning.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 [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81, 117(1): 30—64.
- [ 16 ] John H. Dunning.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C]. in Khushi M. Khan, eds. *Multinationals of the South: New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Hamburg: German Overseas Institute, 1986: 15—47.
- [ 17 ] John H. Dunning.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1): 2—5.
- [ 18 ] John H. Dunning, Rajneesh Narula.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Revisited: Some Emerging Issues[C]. in John H. Dunning, Rajneesh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38.
- [ 19 ] John H. Dunning, Roger van Hoesel, Rajneesh Narula. Explain the ‘new’ Wave of Outward FDI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Taiwan and Korea [M]. Research Memoranda 009, from Maastricht: MERIT, Maastricht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1996.
- [ 20 ] Magnus Blomström, Ari Kokk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s of Technolog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1, 22(5/6): 435—54.
- [ 21 ] Marian Gorynia, Jan Nowak, Radoslaw Wolniak. Poland and It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2007, 45(2): 52—74.
- [ 22 ] Michael J. Twomey.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with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M].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Conference, 2000.
- [ 23 ] Miguel Fonseca.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hypothesis: a Panel Data Approach to the Portuguese Case[R]. FEP Working Papers, 2008, No. 303.
- [ 24 ] Paz Estrella E. Tolentin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 25 ] Peter J. Buckley, Francisco B. Castro.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the Case of Portugal [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1998, 7(1): 1—15.
- [ 26 ] Pichl, C. Internationale Investitionen, Entwicklungsniveau und Landesgröße[J]. *WIFO Monatsberichte*, 1989, (4): 259—66.
- [ 27 ] Rajneesh Narula.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Structure: Globalis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 28 ] Rajneesh Narula, John H. Dunn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New Real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28(2): 141—67.

- [ 29 ] Rajneesh Narula, John H. Dun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and Globalisation: Some Clarifications and a Research Agenda [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10, 38(3): 263—87.
- [ 30 ] Rajneesh Narula, José Guimon.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n a Globalised World: Implications for Eastern Europe [M]. 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2010, 1(2): 5—19.
- [ 31 ] Roger van Hoesel. Taiw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C]. in John H. Dunning, Rajneesh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280—315.
- [ 32 ] Sanjaya Lall.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Some Conclusions[C]. in John H. Dunning, Rajneesh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424.
- [ 33 ] Terutomo Ozawa. The macro-IDP, meso-IDPs and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 (TDP) [C]. in John H. Dunning, Rajneesh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42—73.
- [ 34 ] Xiaohui Liu, Trevor Buck, Chang Shu.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xt Stage: Outward FDI?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5, 14(1): 97—115.

## A Review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Chen Taotao Zhang Jianping Chen Xiao

(Department of Financ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NDRC, Beijing 100038, China; Department of Financ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theory (the IDP theory) put forward by John Dunning states that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t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re systematically relevant.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described in the IDP theory is significant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implementing the "open" development strategy, we reviewed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skeleton of it and its shortcomings, with a vie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IDP theo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la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realizability of "op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 Theory; Inward FDI; Outward FDI

**JEL Classification:** F21 F23 O19